

2001 年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形势

胡安·卡洛斯·莫雷利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邀请我与尊贵的同事、学者和中国党政领导一道，参加这次国际学术论坛。

我们十分清楚，无论对中拉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还是对拉美人民的福祉来说，召开本次论坛的倡议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十分积极地参加这次活动，企望能够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问题的所在，了解我们怎样一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为维护持久的利益，实现稳定、持续和长久发展的目标而努力。

我谈的主题是“2001 年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形势”。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次危机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包括阿根廷人和外国人）都在进行探究，以便弄清危机的规模有多大，为什么始料未及，在社会、政治、经济、金融、产业甚至文化方面产生了哪些严重后果。

显而易见，这场如此规模的危机并不存在惟一的答案。危机造成了国家体制结构的衰败，使国际信贷机构产生震惊，对它们开出的无所不灵的“药方”产生怀疑，对直至当时盛行的信贷系统产生冲击。我说“直至当时”，是因为现在谁也不会怀疑那些可恶的信贷政策使债务国和债权国负有同样责任：前者在经济上失去偿债能力，后者在技术和道义上失去偿付能力。

就在 33 个月之前，我们落入一场始自 1998 年的经济衰退的谷底。衰退持续时间之长是 1930 年以来未

曾有过的。仅 1 个月内，批发价格上涨近 20%，汇率趋向螺旋式攀升，一些人建议采取高通货膨胀手段解决银行债务问题。2001 年 1~10 月，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流失近 200 亿美元；失业率突破 25%；贫困人口比重达到前所未有的 18%，赤贫人口高达 890 万；经常账户的定期存款被冻结；银行长期关闭，在自年初起的 85 个工作日内，25 天无法营业。国家货币已然消失，在 11 个省发行和流通 14 种不同货币。国家和省级财政失调使国家濒于破产，联邦制名存实亡，在财政金融上依赖联邦政府。很多人认为，向 IMF 讨要 200 亿或 250 亿美元贷款是惟一可行的出路。广大中产阶级走上街头，社会和政治骚乱笼罩大城市的很多街区。

简而言之，这种形势是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即用外部贷款填补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10 多年前，阿根廷实行被称为“货币可兑换”政策（或叫作“兑换局”政策），它把本国货币与美元等值挂钩，并禁止在没有美元相等储量的情况下增发货币，以保持本国币值。

这一政策控制住了野马脱缰式的货币（比索）发行。在此之前，货币发行失控曾造成超高通货膨胀和生产系统瘫痪。控制货币发行进而刹住通货膨胀是根本所在，刻不容缓。但仅此不够，还缺少与货币可兑换政策相辅相成的“财政可兑换”政策，以便控制公共开支，保持国家预算平衡。但是却没有这样的财政政策，结果是货币发行控制住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举借外债。债务不断膨胀，直到难以用外债弥补财政缺口和资本抽逃。

今天，我们承认国家面临的使命仍然十分艰巨，但是形势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目前，我们可以认真谈论中期打算了。当前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允许我们坚定地向前看，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

这并不是某个政府的政绩，或某项经济政策的收效，而是阿根廷整个社会的功劳。

阿根廷社会得以摆脱历史性规模的危机，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方面，希望产生刀鬣；另一方面，因为恢复了“自尊”，即决意恢复“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排斥外部世界，而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基于我们地区和自己的目标来观察世界。确切地说，恢复了民族尊严，但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戏谑性地模仿第一世界，也没有犯排斥国际环境的幼稚病。

目前，阿根廷人应该接受这种思想，即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完成尚未开始的使命，如何使目前的趋势保持下去，怎样稳定目前相对正常的状况，特别是如何保证为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抓住这次长治久安的机遇。

当然，为了完成巩固形势的使命，需要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这里，我主要谈一下经济方面的因素。

阿根廷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却遇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选择，即“如何从潜能转向行动”。

无论如何，阿根廷可支配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旦与某种社会经济政策的宏伟筹划相结合，足以保证每 15 年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均翻一番。现行经济计划中包含的若干要素，作为持久性要素，规划“控制”要素，已初露端倪。

（一）对于在 30 年中有 17 年实行实际汇率滞后政策的国家而言，需要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汇率，它应该反映阿根廷生产率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以及相比较而言的变化情况。

尽管经济并非是一种“硬性”科学，但是某些结论是不能够忽略的。人们可以通过一项法律宣布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存在，却无法避免引力作用的结果。同样，人们可以宣布阿根廷的币值高于其他货币，却无法避免币值高估造成的后果。

如前所述，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是债台高筑、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遭到破坏。加强本国货币的惟一长久的形式并不来自于一种可兑换法，而在于保持宏观经济平衡，保持一种考虑比较生产率的货币比价。

（二）在制定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时，必须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国家正在实行的是什么政策。标新立异或作试验样板并不是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实行一体化的良策。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外部世界实行日益灵活的政策，甚至在发达国家——始自 1992 年英镑的贬值——也是如此，那么，选择相反方向道路的结果就是与世界的联系仅限于金融参与，而与世界的实际联系即生产和贸易关系受到严重扭曲。

（三）经济政策应该利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推进结构性改革。

十分遗憾，我国却没有这样做，政策调整通常是在危机之中进行，这加重了社会后果，丧失了实行政

策调整所需的最起码的政治共识。

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欣喜于过渡性的成效，似乎这就是最终成果，并由此做出异想天开的推断。应该扭转这种思维方式。

(四) 宏观经济平衡是根本性的，在这种意义上，公共开支和财政平衡是核心问题。在正常条件下，目标应该是保持整个经济周期的财政平衡，这意味着在周期的高涨阶段，有能力创造财政盈余。

(五) 税收政策在中期的形成过程中，应该包括社会公正、投资优惠待遇、技术革新、广泛开发其价值链的出口、向工人合股资本开放和人力资源投资。

这些构成了促进我国经济恢复并实现 8 % 的年增长率的几种必要因素。在结束我的演讲之前，我想告诉大家，后天（3 月 3 日）我国将结束书写其近来经济史上最复杂的篇章之一，即外债转换。就此，将结束其偿债“破产”的历史，结束 2001 年 12 月开始的进程，当时在任总统罗德里格斯·萨阿单方面宣布停止偿还债务。迄今为止，阿根廷拖欠债务总计 818 亿美元。实行转换的债务占拖欠债务总额的 75 % 以上。债务谈判在技术方面是复杂的，但是进行得极为正常。

谈判进行了 38 个月，双方讨价还价，以便解决 152 笔拖欠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转换成以美元、欧元、日元和比索计价的 3 种债券：平价债券、准平价债券和贴现债券。

我还要指出，一般来讲，阿根廷的要价是平均减免债务 50 %。欧洲、美国和拉美地区的 90 % 的金融机构参与了债务谈判。34 % 的拖欠债务实现了转换，获得圆满成功。

目前，为结束 2001 年的危机，阿根廷政府还面临其他一些谈判任务：与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就签署的合同重开谈判，与 IMF 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这些将有力地促进阿根廷的经济增长。

（译者：拉美所宋晓平；责任编辑：蔡同昌）